

關於增強黨性的文獻
第三集

008.3

7777

12

新

關於增強黨性的

文獻



第二集



2959419

印編部傳宣局分大中遼熱冀共中

月五年七四九一

目次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五
整頓學風爲風文風（毛澤東）	八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	二二
『農村調查』序言二（毛澤東）	三五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	三七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四四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五七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的與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單位將所號召者深入實施、突發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此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則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便而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平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及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典型的具體幹部之歷史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動機與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的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般號召、一部隊、一部隊內部亦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亦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



導與學習相結合的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向下級具體單位的具體人員，具體事件學習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具體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行政首長為核心的少數積極份子為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與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變為少數人的空忙。假如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又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與提到高級的程度。在何有群眾的場合，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與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而這三部分人的比例，又大致都是兩頭小，中間大。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份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通過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份子，爭取落後份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合群眾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群眾團爭中（例如整風學習）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團爭所能形成的。任何一個偉大的團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與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完全統一的，必須不斷的提提在團爭中產生的積極份子（英雄）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绌的分子，或消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及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合群眾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比較地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蘇聯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第十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中去。這個領導骨幹的標準，應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說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否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無論是執行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他任何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均須採取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四)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系統的意見），又向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並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在向群眾堅持下去。如此循環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辯證論，或方法論。

(五) 領導幹部與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向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於行動時，要將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均必須在此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此問題上存在過的錯誤認識。許多同志不注意與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意與不善於使消極領導核心與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意與不善於總結群眾鬥爭的經驗，而喜歡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意與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近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的領導。此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習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 正確的領導意見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在集中與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俱已這樣做，而且叫別人也是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作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

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任何工作(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防奸工作等等)上級領導機關應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該使總負責人與分負責人那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一件工作可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解決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自己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學校的行政首長，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的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夠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機關，一個學校，或一個部隊，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個一定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還在該地區、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與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及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亦不要不分輕重緩急的沒有中心的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與工作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堅持地貫徹下去，而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項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

領導方法問題。

(九) 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予一一說到，由各地同志根據本決定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領導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與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科學的領導方法和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與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故爲了反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科學的領導方法。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來，我黨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目以爲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着。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沒盡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並未徹底消滅。對於二十年來由於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幼稚病所

鐵，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澈底認識。劉廷安來報告工作的綱要，其中的多數，對於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係方面，在敵對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針，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環境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家強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亦比我們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租界大業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担负領導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腐敗，掃除主觀主義積習，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的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 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黨委或省委、各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黨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 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黨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報，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選派有經驗的人組織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團體（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實的方法。由一典型再及

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着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佃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着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羣衆、游民羣衆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傷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團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各加學界文化人活動分子，在一處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簡短平實的傳記。此種傳記，要實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領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請人來問，問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交際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僑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誌、府誌、叢誌、家譜，加以研究。

(四) 除中央及各地所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着重對於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並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 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繫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實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幹部與學生關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讀報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並實行考評。

(六) 完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繫起來，向黨的委員

及幹部會議作報告，並討論實施辦法。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爲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還是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因爲如果沒有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徹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按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和人民一道，向著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還僅爲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些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那麼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官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諸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也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遺風，一種舊風，是從防空洞裏吹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遺毒死，我們全党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人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二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僅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全民族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

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態度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整黨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廣。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關係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說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论水平已算是提得復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較難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說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有了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去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爲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背得爛熟了（笑

），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算就非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一實在這是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說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與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從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死搬硬套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說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不會看的，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份子特別貧乏。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

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槩共知識架干，而不知道這種架干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錯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裝的，是逆行的，是片面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較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菜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莊和我們家的大可又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大大了要煮，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

那末，只要你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用豬頭蓋鍋的滾起來。書是不會定路的，也可以隨便把他打開或者闔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養豬容易得多，比牠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他，他會叫，（笑聲），一本書攤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很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改變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份子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份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一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眼睜共黨史這樣馬糊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共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地去發揚主觀，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

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得出一個指頭，向他括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護馬列主義的人把他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與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則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將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個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

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早年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七包子作序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資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濟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概念之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繫」，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概念。他們天天講「聯繫」，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不去聯繫。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麼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裡「孟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摸來摸去連聲說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全消食呢？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馬列主義不是像看戲、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祕，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神祕。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做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現在比這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醒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一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廢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黨利益，他們講是不適當的特別

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如希望拿全盤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曉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清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現在蘇的，雖然不是張國清，李立三那樣極端嚴重的派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這種不統一現象完全除去。異提個傾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正不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狠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大笑）。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過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這種人吃虧就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的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是老實人？馬恩列斯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是不老實？托洛茨基，布哈林，張國清是不老實，李立三也不老實，爲個人利益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不老實。一切狡猾的入，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爲得計，自以爲很聰明，其實是愚蠢的人，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高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鬭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们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與派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是團結的，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為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因此，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在這條件下，我們同志必須懂得，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的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系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與陝北人民的聯系，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懂得多。無論怎樣進行調查研究，比起陝北幹部來總是要差些。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先後的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區域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與本地幹部關係弄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的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主要領導的同志，他的責任就更大。現在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不夠，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要性，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所以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是譏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觀點，以求與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的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與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協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協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自對自已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與地方幹

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方能根據地的戰爭工作與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調幹部則不給，或以壞的差人，以驕為堅，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羈，這就叫做本位主義，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極為危險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也產生了，這是很好的現象。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說：「老幹部通常經驗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的衰老亡故。」他在這裏談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黨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誠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都是有缺點的，他們還參加革命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實踐中逐漸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必須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的，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個人與黨的關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與地方

幹部的關係，軍隊與軍隊，地方與地方，這一工作部門與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以利戰鬥之目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風，必須澈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實行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於個人與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這都是必須整頓的黨風。單是團結全體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方能戰勝敵人。我們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是確實存在著這種傾向的，有些人並且很嚴重。許多我們的同志，對於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小兒，形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這些同志，學了幾句馬列主義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掃得一條道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與非黨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與我們合作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拒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却不願得這個道理。對於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人，看不起他甚至排拒他，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列斯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的，相反的，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團結非黨非職工，而不是脫離群眾。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的，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是我們可以脫離群眾。使自

已孤立起來，相反，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

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裏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逐漸嚴重，現在黨裏黨的路綫的實行，所以我們要在黨內進行很大的教育，首先要從我們的幹部開始，使他們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與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與實際革命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它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磨滅它。今天不能一下講完，待下次再講。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他們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却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由於這個原故，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整黨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夥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東西，我們都要抵制它，不要使它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它的那一套。任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應該使它在市場上銷售困難。為此目的，就要提高同志們的嗅覺，對於任何東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於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

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實際，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替前線黨」，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的工作更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替前線黨」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患了盲腸炎，醫生把它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病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且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表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把他變爲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方法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

趁著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的演說）

剛才劉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反掉，那它就沒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等於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勢必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已看，那個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那已經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的樣子，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給大家看的，這就非加以矯正，把它打得不可的。

黨八股也就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是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罷！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內戰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這話怎麼講？

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導生，把孔夫子的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們的文章和教習，不論它的内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個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就有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事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

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企圖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這就是絕對的壞，一切腐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予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義向「左」翼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個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為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嗎？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發展，余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

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對於這些東西的摧毀廓清，也就達不到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下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與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的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要的話思想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的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依照八股文章的手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帶。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喜歡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就是『懶婆娘的裹脚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辭業者。因為長而且空，辭業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十萬字。現在是全世界大戰爭時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麼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換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

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些了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些空話。但是主要的與亢的對象，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鬧騰的臭脚，敢快扔到毛廁裏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樣辦了這是好辦的，仔細讀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腹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為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也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兩種很壞的毒藥。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尋覓和恐嚇決不是戰術』。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却深怕人家駁，非常膽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我們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並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應該採用激烈鬥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寬容，那就正中壞人的毒計。但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種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這就是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但是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而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則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乃至流氓無產者所慣用

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附要這組手段。無產階級的長尖銳最有力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格的戰線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披陰作陽來達到名譽、地位和『威遠敬』的目的，那更是半勞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門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頭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了個『ㄥ』字。人字呢？在右邊脚上加了三撇，寫成了『𠃉』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目的也是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真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詩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那都看得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諷刺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諷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調重彈，却偏要向人民群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的，不知道彼此心裡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就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廢三。上海人叫小擺三的那批印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癸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

際」，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而且可憎，後個第三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大學畢業。沒有同人民群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狠，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替群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群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稿沒有多少人喜歡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這話語，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發條筋，像癩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學外國語言。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我們不是硬搬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語言不適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語言。比如「黨與非黨的聯盟」，這是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新憲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就吸收在哈甘寧邊區區的蘇政訓課裏面，講成「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如此等類，總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不可。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現在民間的語言，大批地是由古人傳下來的。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掘發，只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合理的東西還應該吸收，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則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有用語言，一概不接受，不肯下苦工去學。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覺」。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這個毛病必須醫治。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文記者是宣傳

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必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群眾的語言要用功學習。如果我們不學習群眾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群眾。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你跑去一看中藥舖，那裏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種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聲疾呼，第二是「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第五是ABC，小abcd，還有阿刺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舖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理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舖，沒有什麼真正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看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的開這個中藥舖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的最幼稚的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關係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電報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內部聯系的標幟，排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做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種遊戲，使人不用動腦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裏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裏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就得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畧的調查研究，才能把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畧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問題。而於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

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糞穢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及矛盾的所在，這派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替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當當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尋蹤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不能發現基於基本的兩個矛盾側面所發生與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的矛盾側面，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朗，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說，如果是重要的而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辦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了，所以必須給它指破，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的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道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呀！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臉上還留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別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道院叫做輕車重負。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與負責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篇，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糊糊的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罪狀自明。

每類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開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裏面說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病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中討黨八股的徵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能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文字的形式。這種形式，早已產生，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黨八股之後，新的語言文字的形式就可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游說要有黨八股，開會也有。『二開會，三報告，四討論，五散會』。假使每句每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但就是黨八股嗎？在會馬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黨，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聽好像對人不起。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黨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造麼？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了，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激頭激尾激裡激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裏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說睡不了教條主義與黨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更要留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什麼大眾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要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委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喚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裡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有興趣。

第一編是關於黨史上摘了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提到列寧寫傳單的態形：「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做天流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其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當在某一個工廠裏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裏的態形的，——立刻就以爆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宜。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曾揭露廠主剝削虐待工人的事實，曾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曾寫着工人們底要求。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機休上的高潮症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日常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着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曾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甫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不然，就是列寧也寫不出的，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麼？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爲是，諛諛其談，而是要照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出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該學會與群眾說話，就臨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群眾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思想，都要反映成千百萬群眾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群眾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用簡單的語氣，具體的口吻，用群眾懂得的譬喻，來和群眾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

「實在的，你們只要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寫得如何深奧呀！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不用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斯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祖國的規則，把這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喬維克的法律。當你寫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視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你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寫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療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讀是「法律」啊！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裏選出的，是魯迅讀北斗雜誌社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呢？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肚子裏沒有什麼東西硬要拉屎麼？不調劑，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三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留情。寧可將可作小說

的材料編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復複雜，有些事得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的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A.B.C。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却正是違背魯迅的呵！

最後一篇文章，是六中全會譴責你的民族化。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會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談馬克思主義，縱令你把馬克思主義讀一萬本一千遍，也還是一個假冒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還是一個「老鼠上稱鈞，自己稱自己」的假理論家。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詞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實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這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這就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裏叫空洞抽象的詞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就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牀。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的決定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同它做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洋八股廢八股，教條主義等類，實行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

望同志們加以考慮，加以分析，並要分析各人自己，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你的愛人商量一下，跟你的知心朋友商量一下，跟你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農村調查」序言二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即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一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通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家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這些西望，這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師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與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兩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甚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還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師調查找的是，一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開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開得中國監察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官吏。其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政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限階同下的決心，沒有求知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竟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用做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做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

，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說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的發言權的。有許多人的「下車伊始」，就嘩嘩哇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個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就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搖惑有間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實事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預得了，只是人家不預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稿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一一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

於國內國際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就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材料與注重研究的系統而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門造車」，「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敷衍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談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談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事情：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却有許多同志步這種作風後塵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村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教導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则：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提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戰略，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惡種流傳，禍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鄭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區貨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讀『資本論』，『富』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理論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端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是相當的大，不可等閒視之的。

爲了反復證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明瞭者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真得中國，不認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繫；不是馬要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馬我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寫，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却相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個人極端主觀，忽視客觀。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其事求是之意，有歸家取驄之心。華而不實，隨而不堅，日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欲差大由滿天席。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有一百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像下公孫，頭重脚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配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裡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馬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但是個得希臘，而且要個得中國；不但要個得外國革命史，還要個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個得今天，還要個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的理論問題與策畧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的「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辦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玩弄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真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應運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套詞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野蠻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超羈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

「頭重脚輕極底淺」，也不是「黃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請聽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整黨整風的基礎二環。

(二) 對於近年來的中國史，匯集人材，分工合作的做法，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範，在全世界上也只有這個完全的典範。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

真理與實際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當當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各位參議員先生，各位同志：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不能有任何別的目的，只能有這個目的。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國內，而是國外的，是德意法西斯，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蘇聯英國美國聯合一致，反對德意法西斯侵略，蘇聯紅軍正在為全人類的命運奮鬥。我們的目的同他們一樣，唯一的在於反對德意日法西斯。日本還在繼續侵略，它要消滅中國的獨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中國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中國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合作，只要中國人，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共產黨的這種主張，是始終一致的。中國英勇抗戰已有四年多，這固然是在全國各黨派領袖之下，是由國共合作及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的合作來支持的。但是還沒有勝利，還要繼續奮鬥，還要使三民主義見之實行，才能勝利。

為什麼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直到現在還沒有在全中國實現。為什麼不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當然是一個更好的制度，這個制度在蘇聯早已實行了，但在今天的中國

還沒有實行的條件。陝甘寧邊區所實行的都是三民主義，任何一個建設，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三民主義的原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各階級各民族都要有人權政權財產，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都要各得其所。中間階級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明到中間階級的利益，如果中間階級不得其所，如果中間階級沒有說話權，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事做，沒有書讀，要把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項政策，都是為團結一切抗日人民的、領及一切階級，而特別是領及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階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專制的政策，是真正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使農民有衣穿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有衣穿有飯吃。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扶助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家有利可圖。如此等等，都是為了團結全民，以合力抗日，合力建國。這樣的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就是三民主義的政策。這不是所謂一黨專政，也不是外國的舊式民主，而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這是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戰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分共產黨員，還不著於同黨外人士實行、主合作，還保存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的原則，這就是不聽聽黨意見，要聽黨命令，而不聽脫離聯繫的原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為了防止這一部分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同黨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得聽

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該跟別人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敵人漢奸以及破壞抗戰與團結的人們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志。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同志們，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教育，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辦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對於別人商量問題的態度和作風。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與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敢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綫的。同時也要使各位黨外同志贊成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强黨內教育來消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消除這些毛病。這個叫做內外夾攻，把毛病治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惜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的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於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藉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

在我們爲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奴隸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以至現在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毒勝毒」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出下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藝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藝運動，在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紅軍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彼此都是孤軍作戰，這是因爲當時的反動派把這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原故。抗戰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等於與根據地人民的運動相結合，而我們要把革命

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的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爲整個革命機器的一个組成部分；作爲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有些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有些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黨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是否還有認識得不正確或者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立場。

態度問題。隨着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的採取的具體態度。譬如說，歌頌呢？這是暴露呢？還是三態度問題。究竟持什麼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認爲，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朋友，還有一種是自己，這就是無產階級及共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三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敵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他們「歌頌」呢？總對不應，因爲他們都是萬惡的反動派。他們在技術上也許有些優點，譬如說他們的植樹心，但是好的槍砲塞在他們手裏就是反動的，我們武裝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槍砲奪取過來，但是好的槍砲塞在他們手裏就是反動的，我們武裝軍隊的任務是在把他們的槍砲奪取過來。我們文化軍隊的任務是在揭露一切敵人的殘廢，欺騙及其必然失敗的前途，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朋友，對於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聯合，有批評，有各個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是「歌頌」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批評，就要反對。至於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權，我們當然應該「歌頌」。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間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其身上的包

，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這個改造過程，而不應該只看瑣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給誰看的問題。在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與在大後方不同，與在抗戰以前的上海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抗戰以後的大後方，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裏的政府把工農兵與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黨政軍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對象。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大後方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大後方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只有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延安能看書的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鍊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的接受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為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在他們裏面，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在新四軍裏面，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就應當做很大的工作。我們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倒不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況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

描寫對象與接受對象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言簡不達。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簡，他們是人民大眾的言簡。我曾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好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農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群眾的言簡開始。如果連群眾的言簡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買賬，在群眾面前把你的姿態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貨。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與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一句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窮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了。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農兵總是比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了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稍磅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馬列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列主義常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列主義的基本常識。譬如說，馬列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客觀決定主觀，就是階級戰爭和民族戰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

思想透悟，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說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却要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夢。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道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很深的影響。應該很澈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列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列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還要學習社會，就是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個別狀況，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裏開了三次，大家爲了追求真理，有黨的非常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發生了熱烈的爭論，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爲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話。

我們討論問題，應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錯誤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運動，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事實就是：中國打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堅決和對內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大批文藝工作者與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中與大後方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與任務的區別；目前延安及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察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問題基本上是一個藝術家與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或這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個問題為中心加以說明，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的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甚至還有敵人和國民黨特務機關派來的掛着文藝招牌的好細分子，但是除了這些人以外，却

都是在爲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從事工作的，許多則是還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但是爲什麼這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爲着人民大眾而是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當然，爲着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爲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爲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爲帝國主義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奴隸文化，奴隸文藝。還有一種文藝是爲特務機關的，可以叫做特務文藝，這種文藝的外表也可以叫「很革命」，但是實質却不出上而三圍範圍。在我們，文藝不是爲上述種種人，而是爲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舊形式，我們是並不拒絕利用的。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他就變成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與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爲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爲武裝起來了的工農即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爲小資產階級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

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還在抗日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我們應該聯合他們，但是他們不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他們都有爲他們自己的文藝，我們的文藝不是爲廣他們，他們也拒絕我們的文藝。

我們的文藝，應該爲階級上面說的四種人。在這四種人裏面，工農兵又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人數較少，革命堅決性較小，也比工農兵較有文化教養。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爲工農兵，第二才是爲小資產階級。在這裏，不應該把小資產階級提到第一位，把工農兵降到第二位。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的問題，他們對於文藝是爲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就是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看得比小資產階級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者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些呢？我以爲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的注重研究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去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去教育工農兵。有許多同志，因爲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交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與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與描寫如果是站在無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是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與滿腔的同情，連小資產階級的缺點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偵查描寫，也是衣服是工農兵，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變，有些地方不變，不變他們的感情，不變他們的姿態，不變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隱報，壁報，民歌，民間故事，民間講書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

那是爲着環奇、爲着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爲着追求張中丞後的東西而來的。有時就公開地都染在門，而偏愛知識分子，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屁股還是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那靈魂深處還是一塊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樣，爲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先是開始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是沒有澈底的解決。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却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澈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屁股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了農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爲工農兵的文藝。

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不歸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非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爲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與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有些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譬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爲工農，爲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顯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會說：革命文藝戰線的不統一是因爲缺乏共同目的，而這個共同目的就是爲工農。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澈底解決。因爲那些地方有人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許他們看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是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

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澈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着完全地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列主義，是群眾生活群眾鬥爭及完全適用的活的馬列主義，不是單單書本上的馬列主義。把書本上的馬列主義移到群眾中去，成了活的馬列主義，就下會有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二)

為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如何為法，這是第二個問題。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也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出來了。因為沒有弄清楚為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譬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是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

級的高度去，而是指勞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標準，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它們的源泉是從何而來的呢？無論是哪一等級的作爲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積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收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爲只有這一個源泉，此外沒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則與外國的文藝作品，小也是源泉嗎？也可以說是源泉吧，但是第二位的而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這爲第一位，便是顛倒的看法。實際上，書本和現成品不是源泉是呢，是古人與外國人根以他們彼時彼地所見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批判地吸收這些東西，作爲我們的借鑒，作爲我們從此時此地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成爲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作品的借鑒。有這個借鑒與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借鑒古人與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東西也必須借鑒。但這僅僅是借鑒而不是替換，這是決不能替換的。文學藝術中對於死人與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摹倣與替代，乃是並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和軍事上政治上哲學上經濟學上的教條主義的性質是一樣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学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也是最豐富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願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就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

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譴誶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空頭藝術家。

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雖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誰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地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却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普遍性。活的列寧比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不知生動豐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寧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還要做許多完全和旁人一樣的事，而且能夠看見列寧的人很少，列寧死後大家再也看不見他了。在這些方面，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就比活的列寧強。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飢餓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別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使人民靜寂驚醒起來，感覺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加工的文藝，只有自然形態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藝與提高的文藝都是加工過的文藝，那末它們還有什麼區別呢？有程度上的區別。普及的文藝是指加工較少，較粗糙，因此也較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的東西，而提高的文藝則是指加工較多，較細緻，因此也較難為目前廣大人民所迅速接受的東西。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與敵人作殘酷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愚昧，無文化，所以他們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們所急需的與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向他們作普遍的啓蒙運動，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與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中送炭』的問題，所以對於人民，第一步最

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輕視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於被普及者，則普及及還有什麼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隔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牛斤八兩？這種普及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畜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裏，普及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展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及工作與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導我們普及及工作與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導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會起破壞作用的。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切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群眾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接受能力比群眾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於當前的和群眾同一水平的普及及工作，不能滿足於「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需要，暫時還只是幹部的需要，而不是群眾的普遍需要；適應這種需要應該是一個方針，但是不應該成為今天的整個方針或今天的中心方針。同時應該了解，為幹部，也完全是為群眾，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我們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文學藝術中間，既有從低級程度的群眾文學群眾藝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被提高了的群眾所需要，或首先為群眾中的幹部所需要的，比較高級程度的群眾文學群眾藝術，又有反映來在這種高級程度的群眾文學群眾藝術指導下的，為今日最廣大群眾所最先需要的，比較低級程度的群眾文學群眾藝術（不是所謂低級趣味）。無論高級的或低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與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與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為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為了群眾。高爾基在「工廠」廠史，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十幾歲的兒童，魯迅也用了許多時間與普通學生通訊。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通報，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群眾中做最低級的文學藝術普及工作的同志發生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群眾的資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噴發起來，使自已的專門不致其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之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已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定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是鼓自私自利短視的功利主

—— 藝的僑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與將來利益的統一爲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大與最遠爲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與目前的行會主義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爲自己以及幾個朋友或少數人的集團所備受，而爲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某種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群眾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在較多的人們中發生較大的益處，才是較好的東西。就算你的『陽春白雪』吧，這也是貴族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裏唱『里巴人』，你不去說高它，只顧罵人，那就太可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與『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與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爲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提高，那只是自封爲提高，群眾是不會批准的。

在爲工農兵與怎樣爲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一切問題，例如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題材問題，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因結還是不團結的問題，功利主義還是超功利主義的問題，狹隘功利主義還是遠大功利主義的問題，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我們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術活動，就應該爲這個方針而服務。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爲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即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爲藝術的藝術，超階級超黨的藝術，與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政治，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階級有黨的社會裡，藝術既然服從階級，成從黨，當然就要服從階級與黨的政治要求，服從一定革命時期的革命任務，離開了這個，就離開了群眾的根本上需要。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機器中的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反對這種說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和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小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偉大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螺絲釘，與別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連放或幾技普通的文學藝術也沒有，那革命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爲。思想戰爭與藝術戰爭，尤其革命的思想戰爭與革命的藝術戰爭，必須服從於政治戰爭，因爲只有經過政治，階級與群眾的鬥爭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政治家們，預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爲群眾所領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

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與有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也是無產階級政治與有產階級政治的原則區別。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政治與政治家狹隘化、庸俗化，也是不對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界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與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盟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這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文藝家就不贊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風格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這個團結的範圍大概會更小些。在這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鬭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系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譬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就同時有鬭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鬭爭，或者只有鬭爭而無團結，而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屈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列寧所痛駁了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裏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工農兵。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戰線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鬭爭方法之一，就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裏只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零星問題或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

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都是好的，或較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戰團結的，鼓勵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幫人們倒退的東西都是壞的，或較壞的。這裏所說的好壞，究竟是在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在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是否有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與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與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動機與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利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我們對文藝批評是不受宗派主義的，在抗戰團結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傾向的文藝作品；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反共的或階級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最嚴厲的批判，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抗戰團結的。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也分別看其是否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評，或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以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即使是很高級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世界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的方法論。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

標準，各個階級社會與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與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階級社會與無論什麼階級社會中各別階級，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容其藝術程度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排斥其反動的政治性，而只批判地吸收其藝術性。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例如，法西斯的文藝就是這樣。內容愈反動的作品愈帶藝術性，就越能迷惑人民，就越應該排斥。沒落時期一切剝削階級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政治內容與其藝術形式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與藝術可能高度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內容有害的藝術品，也反對只講內容不講形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存在的。許多同志有着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爲問題的，我以爲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主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文藝理論基礎的所謂「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更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知識分子出

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階級，是社會使我們與無階級處於同一命運，和我們的生活與無階級打成一片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原無故的愛，也沒有無原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的愛』，自從人類分裂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統治階級提倡這個東西，孔夫子提倡這個東西，托爾斯泰也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自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歸於分裂，階級消滅後社會復歸於統一，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在現時期還是沒有。我們不能變法西斯，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只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要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沒有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我抽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爲『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也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是這種缺點只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與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的解決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缺乏歷史唯物論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但人民的缺點主要是從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統治他們的結果，我們革命的文藝家們只應該把它作爲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去暴露，而不應該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只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

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階級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這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平法』」。把雜文用魯迅『法德區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於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的嘲笑法西斯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派，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分子以民主自由的狹窄邊區及各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可以大聲疾呼，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破。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平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同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除諷刺了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朋友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三種態度各不相同。我們豈不一概發給諷刺，但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無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人民及其無鋒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的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的愛人，再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角色。這種人

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蠶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副作用。」關於動機與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公，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立場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願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要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顯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或者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面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是並沒有懂得的。

「學習馬列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防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列主義，不過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的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列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學藝術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們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列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並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那末，馬列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

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階級的創作精神。對於無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被破壞？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的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着三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厲的整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完全沒有入黨的人，頭腦裏還裝着許多剝削階級的講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那套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因此我們的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極大多數都是純潔的，但是為黨領導革命運動更好的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把這部分從思想上組織上認識地整頓一番。因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階級對非無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龐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階級

和人民大眾是不能造就我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亡種的危險。只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向敵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根據地和非根據地，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根據地，不但是兩個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社會。到了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的工農兵和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群眾中間，還是像我上次說的「不熟，不備，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同志想：我還是為大後方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變的，大後方讀者，不需要從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的老故事，他們希望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世界，新的世界。所以應是寫根據地的群眾的作品，才應有全國意義。法捷也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影響。中國向前進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就是敵人，對於甚麼什麼鬼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

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迅的榜樣，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馬狗，躬犖犖，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與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在今後長期的學習與工作中間，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創造出許多為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一定能够把規模大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完)

